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已酉年秋

译注 刘聿鑫 刘晓东
审阅 黄 葵

孟子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孟子选译



本书责编：何志华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译注

刘聿鑫

刘晓东

审阅

黄葵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712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释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

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妄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是春秋时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关于他的身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叙述得很简略，不可详考。根据各种记载，我们只能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由母亲把他抚养成人。汉代还流传有他母亲“三迁”和“断织”的故事：据说孟母为了使孟子得到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三次选择邻居迁居，又曾因孟子逃学而割断织布机上的线来警戒他。可见孟子从小就受到母亲很好的教导。

孟子长大以后，受学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接受了孔子一派的政治学术思想，在学成并从事了一段教育活动后，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便带

领弟子到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对诸侯进行游说。当时，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种流派的思想家纷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和思想界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在游说过程中，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的人物展开过一系列的争鸣辩难。

孟子首先到了魏国，与梁惠王谈了许多“与民同乐”和实行“仁政”的大道理。梁惠王感兴趣的却是使魏国尽快强大起来，向齐、秦等国报仇雪恨，嫌他的言论太高远迂阔，因此对孟子这套道理反应并不积极。梁惠王一死，孟子便离开魏国到齐国去了。在齐国，他曾一度成为“客卿”。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齐宣王宣传王道仁政，而齐宣王的理想却又是效法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征服秦楚，统一天下，因此孟子的主张显然也不合时宜，尽管他受到礼遇，但主张却不能被采纳。

孟子在游说中的一连串失意使他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于是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把理想寄托于将来，和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齐整理自己的游说经历和辩难内容，通过这些来阐述政治理想和学术思想。后世流传下来的《孟子》七篇，虽不是孟子的亲手著述而是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根据他的言论事迹编定的，但从书中论

辨方法、文章语言风格的统一看来，《孟子》一书的确反映了孟子的完整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把《孟子》作为孟子个人的作品加以分析。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阶级分化激烈的时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统治阶级的虐政之下，“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统治者呢？则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仁政”的主张。要实行“仁政”，首先就要“制民之产”，也即是让人民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孟子认为：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财产，便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便会肆意非为，违法乱纪，陷入犯罪泥坑；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对他们处以刑罚，这就是残害人民。所以贤明的君主应当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老百姓能养家糊口。好年景，丰衣足食；坏年景，也不至于饿死。孟子并且根据自己的理想，设计并描绘他的康乐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人民有了一定的土地财产，如果统治者施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将人民的劳动果实掠夺一空，那末人民还是无法生活，所以，他的“仁政”又包括“省刑罚”和“薄税敛”。前者是说统治阶级要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后者是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着重

指出，赋税有三种，即“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贤明的君主对这三种赋税只征用其中一种，其余两种暂时不用。如果同时征用两种，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如果同时征用三种，那一定会使人民家破人亡、父子不相顾了。

可以看出，孟子这一“仁政”主张，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夏桀、殷纣之所以丧失了天下，原因就在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因此得天下的关键就在于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给予人民所需要的，而不施加人民所不喜欢的事物。他警告统治者：如果对人民施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人民逼得走投无路、无法活下去的话，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推翻暴君的统治。当然，孟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望君主巩固统治权，但是他能够把人民视为天下国家的根本，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力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在道德思想方面，孟子十分重视孝顺父母和敬从兄长。他在和齐宣王、梁惠王谈话时，就劝他们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把“孝悌”同“仁义”一样看待。根据古代的传说，舜的父亲瞽叟偏爱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杀掉舜，继母和弟弟

也想杀死舜，但舜还是尽力地孝亲爱弟。孟子十分称赞舜的做法，认为由舜转移了天下的风俗，加强了天下父子之间的伦常关系。孟子这样重视孝悌，是因为他把孝悌与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中的伦常关系同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是统一的。君主有了孝悌之心，如果推广开去，就会爱护臣民；臣民有孝悌之心，孝敬父母，遵从兄长，如果推广开去，那也就会忠君尊长，所以他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对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观念，并不单纯把君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根据君的所作所为，去分析认识。他极力推崇商汤推翻夏桀和周武王推翻商纣的正义行为，多次援引，以为是圣王征伐不道的例子。他明确指出，桀、纣是“贼仁”、“贼义”的独夫民贼，把他们推翻杀掉是应该的，不能算作“弑君”。孟子曾经问齐宣王：“您的一个臣子到楚国去了，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妻子儿女都在受冻挨饿。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断绝来往。”孟子又问：“假如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他的职！”孟子说：“一个国家政治搞得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很明显，孟子言下之意是如果国家政治搞得

一团糟，国君也要“撤职”。这些言论大胆激烈，直接说到齐宣王的身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比孔子以来的儒家单纯“忠君”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在哲学思想方面，孟子倡“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美好的。人人具有同情别人、知道羞耻、尊敬他人、明瞭是非等本质，这都不是受客观事物的影响而形成的，他曾举例说：一个小孩掉到了井里，人们都想去救他。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同情心，人们并不是出于想结交小孩的父母或别的什么想法，只是出于心中本来就有的善良品德。既然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坏人呢？孟子也用“性善论”来加以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有些人在社会生活中把善心给埋没了，于是便成了坏人。只要通过教育，把这些人失去的善良本性恢复了，便又会成为好人。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孟子的“性善论”正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因此是不能成立的。但它作为历史上人们修养品德和施行“仁政”的理论根据，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认为人性是善的，能够使人感到自身本来就具备为善的优越条件，增强为善的自信心，在善良本性的基础上自觉

地提高自己，积积上进。这一观点在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他是站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主流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并为之服务的。由于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并有发挥，同情人民，因此对当时的政治有许多改良的建议。他的主张大都从一种良好的愿望出发，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不为各国君主接受。例如他讲“仁政”，主张关心人民疾苦，一直为人称道，在后世起过一定作用，但他的理论根据只是“恻隐之心”，这种根据太薄弱了，或者根本不能成为根据，因此他的“仁政”没有得到施行。又如他主张恢复“井田制”，实质上是使人民能有一定的私田，其目的是要保证谷禄的平均。这出发点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已经出现土地自由买卖现象，显然他这种主张也行不通了。再如他看到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而深恶痛绝、一味反对，可是诸侯各据一方、阻碍社会发展的分裂局面却必须通过兼并战争才能促使全国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孟子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是高谈一些大道理，这不能不说他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孟子处在这“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他

既以继承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等“古圣先贤”的道统自居，又以“闢异端”、“斥邪说”为己任，积积宣传他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因此就需要有更系统、更完整的论述方式。在《孟子》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虽然它基本上仍是一种通过问答对话形式记述的语录体，但比起《论语》那种简奥含蓄而又质朴的风格，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辞繁篇巨，而且感情洋溢、气势充沛、洋洋洒洒、波澜壮阔，说理辩论逻辑严密，叙述描写细致精巧。刘勰从文章本体方面评论它说“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鲁迅先生从文学发展角度评论“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汉文学史纲要》）这些评论都是十分精当的。

首先，《孟子》文章表现了雄辩说理的特点。孟子十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各种辩论的方式方法，在论证和反驳过程中，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析理绵密，使对方无所逃遁。有时他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当孟子初见梁惠王时，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只这么一问一答，寥寥数语，孟子就否定了梁惠王重利的观点，直接阐明了自己以仁义为本的政治主张，干脆利索、简捷明快。孟子与景春讨论公孙衍、张仪是